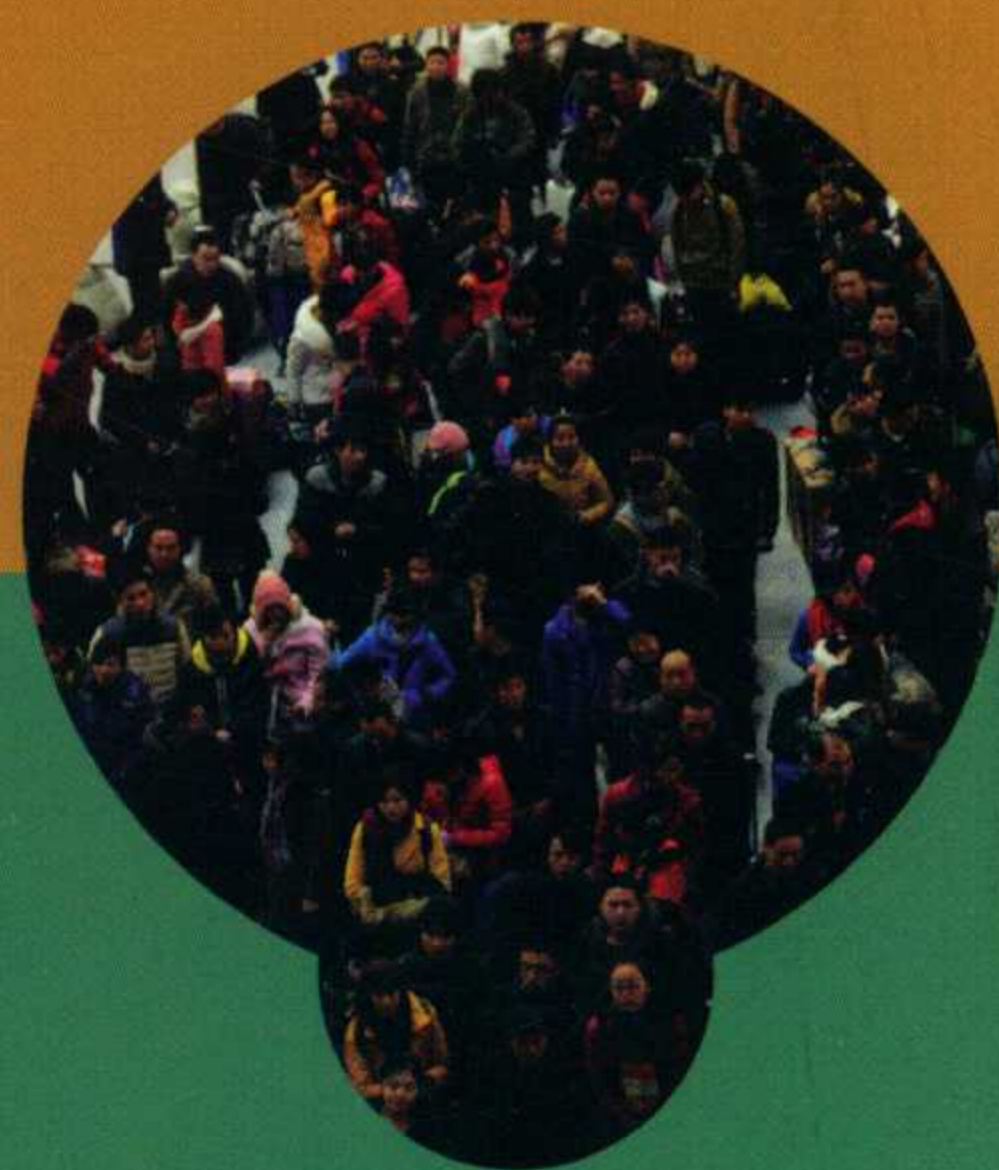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Yunxiang Yan

阎云翔 著 陆洋 等译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

296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Yunxiang Yan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阎云翔 著 陆 洋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 阎云翔著;陆洋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2

(睿文馆)

书名原文: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BN 978 - 7 - 5327 - 7056 - 4

I. ①中… II. ①阎… ②陆… III. ①个人社会学-
中国-文集 IV. ①C9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0803 号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Copyright © 2009 by Yunxiang Ya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阎云翔/著 陆洋等/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6 字数 283,000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7056 - 4/C · 069

定价: 5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献给张光直教授（1931 - 2001）——授业恩师，人生楷模

序 言

凯博文（哈佛大学）

这本论文集的作者阎云翔有过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他曾经在中国北方农村当过羊倌和乡村故事员，后来又在北京大学读本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担任人类学教授。一路走来，他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北方农村礼物馈赠文化的人类学名著，而这个村庄曾经是他在疯狂的“文革”期间生活过并在十多年后又重新返回做研究的地方。随后，他出版了另一部著作，考察在过去30年经济改革的深刻影响下这个村庄在情感、关系和行为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迁。

通过探究经济与社会分层、权力、家庭关系、更广泛的亲属联系、家庭经济、婚姻、青年文化、女性地位、消费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的出现等众多领域的变迁，这本论文集记载了一场正在日常生活领域重新塑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阎云翔断言这一变革已经在下岬村的居民中发生（阎与这些村民朝夕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通常做民族志所需要逗留的一两年的时间），并主张该村的新社会现实是普遍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同一变革的缩影。最深层的变化是道德坐标和道德体验的转型。生活中新的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重塑人际关系、交换、制度和仪式中的文化；同时这些新价值观也在人们内在的主观世界形成一场重构运动并反过来撼动和迫使外在的社会世界向某种新的方向发展。父权制虽然没有彻底让位，但已渐渐被淡化；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敬重已丧失了优先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新的夫妻关系与年轻人文化的倚重；计划经济体

制所确立的社会身份等级正在被一种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所创造的新等级制度所取代；社会不平等正在被再造与深化。

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阎云翔向我们展示了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这种个体主义在过去是不可言说的、发展不成熟的，甚至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而如今却公开地发挥着影响力。这种新的个体主义趋向和自我塑造的潮流最先带来了物质欲望和消费主义实践，带来了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从而将长久以来一直建立在文化道德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变成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会导致腐败的互相利用模式。新个体主义也带来了关于美好生活和什么是善的新理解。当然，中国社会一向都有留给个体的位置；但是，在过去，人们很难公开地毫无顾忌地追求个体的位置，因为它在文化表达上更趋向于社会中心主义。所以，阎云翔向我们展示，中国人的自我与人格已经变得不同了，就像他们的地方道德社会那样正在转型之中。对阎来说，这种新的现实既令人担忧又给人以希望。

作为时代的记录者，阎立足于民族志的详细资料，进行了富有洞见的人类学分析，并对有启示性的相关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层次梳理，这三者的完美结合令人钦佩。他还在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不同时代之间进行对比分析。确实，阎的细腻描述和有理有据的阐释使他的跨文化比较进入了当代学术界关注的核心：即理解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以及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因此，这本书不仅仅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和中国人，也对我们思考美国和美国人、西方和西方人大有帮助。

1978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做调研。在此之前的10年中，我已经与家人一起在中国台湾地区生活和工作了3年，那段时间的经历对我影响深远。1978年的中国留给我的印象难以忘怀：“文化大革命”留下的苦果、摆脱“极左”政治的努力、新出现的商业行为的合法性。最为深刻的印象还是人们的兴奋与机遇——虽然人们当时所处的社会是那样严峻、毫无生气，在过去的30年中与世隔绝并且仍处在穷困之中，但是

他们正小心翼翼地音乐、艺术、穿着、饮食、人际关系和社会体制上进行着新的探索。在此后的30年里，我到中国进行了难以数计的研究访问和私人旅行，每一次都让我为现代中国的建设步伐和建设程度感到惊讶。通过研究访谈和与中国朋友的来往，我能感觉到人们自己正在发生着变化。但是我还不能完全领会，如果既不用过分简单的普遍性概括也不用自相矛盾但却符合多元化印象的并置比较法，我们该如何记录和阐释这纷繁复杂的变迁漩涡。似乎没有任何理论框架能够解释我所看到和经历过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噪声交杂的”的混乱，即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称之为真实的现实。发生在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国家，再加上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巨大的差异，这种令人目眩的复杂多元的真实现实似乎根本无法用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

所以，我起初怀疑阎云翔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内部含有一条提供逻辑一致性和分析精确性的金线。他描绘了社会生活在下岬村和其他地方是如何变迁的图景。正是这个图景中详细的民族志资料使我确信他找到了仍在形成之中的新现实的一个关键方面：一种中国式的个体主义的浮现把全球进程与地方实践结合在一起。几十年前，台湾地区的两个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杨国枢和黄光国提出，虽然社会关系网中成员之间的联系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核心，但是每一个关系网却以个体为中心。因此，哪怕在一个以集体关系为特色的社会中，个体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主张推动了社会理论的中国化运动。阎的工作所论证的是，个人的中心位置已经强化，在集体进程下个人实践的新合法性已经孕育出对自我利益的公开表达，而以前只有通过家庭主义或集体主义的语言表达才能在文化上被接受。阎具有人类学家的天赋，能够通过对一个情景接着一个情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的生动描述来阐明这个观点。

当然，描述一个村庄的地方性现实是一回事，推及到整个中国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阎的阐释如此具有说服力、他的分析框架如此条理

分明（再加上他对中国其他农村和城市地区现实的对比分析），以至于熟悉今日中国的读者将会发现自己也可以提出额外的案例证明这个观点，即新的自我存在方式正在当代中国新的道德语境下浮现出来。

我们不应该指望一个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去界定这一个体化过程的层次和具体领域。这将是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所有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共同任务。不过，阎在以下各章中已经取得的成果足以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已经将我们引向关于中国人生活体验的一系列新课题；我相信这些新课题将改变中国研究领域，同时激励在人类学和亚洲研究中已经萎缩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从长远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将会走向何方？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提供良好生活的新意识形态将会进一步深化个体化吗？这样做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政治现实吗？或者，非自由主义的国家会限制个体多元化的范围，这样，个体化就像全球化一样向国家的利益低头让步？在过去，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一直主导着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阎的贡献是正在成长中的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人类学认为更加重要的发展——虽然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变迁的基础上——正在以社会生活的方式进行着。理解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长期指南，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正在建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蓝图。我们必须记住，这座新的文化大厦的非同一般的基础也包含了新的做人方式、新的道德生活和对未来的新期待。

（陆洋 译）

目 录

序言（凯博文）	001
导论：个体的崛起	001
第一章 农村改革对经济与社会分层的影响	028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	050
第三章 夫妻生活的胜利：家庭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080
第四章 实践性亲属关系	112
第五章 农村的青年与青年文化	135
第六章 青年女性的崛起与父权的衰落	160
第七章 个体能动性与彩礼的演变	182
第八章 如何做一个工于算计的好人？	212
第九章 社会转型期的消费主义	235
第十章 麦当劳餐厅里的社会空间	268
结论：社会的个体化	298
附录 中国的个体化之路	320
英文版原始出版者名单	349
致谢	351
中文版致谢	353

导论：个体的崛起

本书所汇集的论文记录并考察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两个方面，即个体在社会实践中的崛起和社会关系结构性变迁导致的个体化进程。在“导论”中，我将重点讨论个体的崛起，并在跟踪研究的基础上为本书各章提供一些更新材料和评论。社会的个体化和中国案例的理论含义将在“结论”一章中得到深入讨论。

改革时代的回顾

无论本书各章最初的出版日期是何时，它们实际上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产物。十章中有八章成稿于 90 年代。虽然其中几章含有我在新世纪田野工作的新素材，但它们主要都取材于 1989 到 1999 年田野调查的资料。本书的前八章聚焦中国东北下岬村的个体村民的能动性和社会行动。从 1971 到 1978 年，我曾经作为一个农民在下岬村生活与工作过 7 年；之后我又分别在 1989、1991、1993、1994、1997、1998、1999、2004、2006 年和 2008 年重返下岬村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关于该村的详细描述，参见 Yan 1996：22 - 42，and Yan 2003：17 - 41）。第九和第十章探讨消费主义和全球化对个体的影响，主要以我在北京的田野调查为基础。

毫无疑问，自从 1978 年国家正式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一

直经历着迅猛而彻底的改变，中国经济一直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快速增长；到 2008 年时，中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尝试和学习的过程，中国在这 30 年走过的绝不是一条线性捷径。因此，改革时期的每一个年代都各有特色，对中国社会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我认为，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角度看，20 世纪 90 年代是尤其富有活力和弹性的重要十年。

在宏观层面上，改革时期的第一个十年里，党-国家和精英阶层（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都一样）都努力通过许多重要的制度变迁摆脱激进政治的影响。这些制度变迁包括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去集体化，到 80 年代后期许多大胆却并不一定成功的城市改革。在社会变革的许多方面，1989 年是一个转折点，其中之一是 1989 年以后党-国家和精英反而更坚决地告别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虽然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权力还保持着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但是邓小平 1992 年南下视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官方接受市场经济和重新评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好例证。

从市场转型的角度看，下列因素表明 90 年代可能是最开放的十年：私营经济显著增长，国家逐渐放松对社会生活的严密控制，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被新自由主义所侵蚀，生活机会的新结构以及促使亿万中国人迁移的流动渠道的开放。因此，到了新世纪之交，具有魔力的“改革”一词开始在操作层面具有不同的含义。新世纪的改革已经不再以改变过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事实上，它往往意味着经济资本持有者和政治掌权者的协商和论战而导致的政策调整。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指出，在改革时期的第三个十年，改革的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参见 Sun 2004）。取而代之的是脱缰野马般的市场经济生产力和强势国家权力的联盟；它们的联手创造了 GDP 增长的奇迹、国家财政收入和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与此同时，还导

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弱势群体的新困境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目前，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领导下，中国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并且针对这些负面后果进行各种政策调整。但是，90年代界定的发展模式不太可能被迅速改变。

本书探讨的不是中国在90年代成功迈向市场经济的历程，而是从一个不同却同等重要的角度——从那些有血有肉的个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应对制度变迁的视角和经历——来考察变化中的中国社会。

在整个90年代，每一次回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我都会真切地感到农村和城市居民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活力和适应力，以及从困惑、幻灭、鼓舞、希望、兴奋到实际行动的各种表现。虽然我很难充分解释我的所有观察，但我确认中国社会在改革的第二个十年中正经历着结构性变迁。在一篇文章里，我用“迁徙”、“再定位”、“再分层”等术语从个体的日常生活的角度来描述这些变化是如何出现的。我还注意到这一变迁过程的核心是出现了一个“中国梦”的概念——即，一个人可以通过智慧和辛勤劳动改变其命运的信念。我还观察到“自力更生”的含义已经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标语变成了一个在日常生活竞争中的个人主义的口号（详见 Yan 1994）。然而，那时我还不能看清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正在我眼前展开。

我的顿悟发生在2007年。当我参照第二现代性或自反现代性理论（Giddens 1991；Bauman 2001；Beck 1992；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2）——尤其是个体化命题——去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模式和趋势时，一切都豁然开朗。我发现，虽然中国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却展现出第二现代性时代的许多个体化特征以及在西方应当属于现代时期甚至前现代时期的其他特点。作为一个扎根于田野的人类学工作者，我长期关注个体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快速变化：他们越来越要求自我的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反对由来已久的集体主义道德说教。自从1989年进行第

一次田野工作后，我有幸利用各种机会记录个体村民和城市居民如何思考与行动，如何与各种制度变迁互动。然而，只有当我 2007 年回顾这些田野材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工作揭示了，由于改革时代制度变迁的结果，个体在中国迅速地崛起（有关中国个体最新的值得关注的研究，参见 Hansen and Svarverud 2010）。虽然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崛起是拙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心论点之一，但在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它在社会层面的重要含义，也就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本章将回顾我的研究在个体的崛起方面的主要发现；我还会利用新的田野调查资料为以下十章的内容做些补充。贯穿本书的共有 5 条主线，分别强调个体崛起的一个特殊方面。因此，本书将按照如下顺序呈现这些主线：解放个体的制度变迁、个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强势国家的角色、中国个体化过程中个人主义的缺失，以及全球化尤其是全球消费主义的影响。

通过体制改革给个体“松绑”

众所周知，改革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农村改革，而最初的一步是由个体村民冒着被惩罚的危险迈出的。那时，国家所做的只不过是容忍那些地方领导不去干预有胆量村民的行为（参见 Zhou 1996）。这些首创行动通过把责任和收益一起分摊给个体生产者，从而激发了劳动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当这些早期试验取得丰硕成果后，国家启动了全国规模的体制性改革，1983 年取消了农村集体化；除了土地，几乎所有集体财产都私有化了。

在 80 年代，形容制度变迁最常用的术语是“松绑”。所有的改革措施，包括最激进的非集体化，只不过是从集体和计划经济的束缚中给农民松绑。给个体松绑的制度性改革策略也延伸到城市改革中。受到农民

家庭承包土地顷刻成功的鼓舞，1984年福建省的55个国有企业领导向上级呈交一封公开信，要求松绑，意思是他们想从计划经济的严格控制下获得更多的决定权和管理权（《福建日报》，1984）。这封信在1984年3月22日发表在省报上之后便受到其他官方媒体的一致赞赏，称它吹响了“企业改革的号角”。

然而，在改革初期的每一个阶段，改革者和他们的反对者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很担心赋予个体村民（或工人、企业领导、地方政府机构等）自主权和自由以后可能发生的不可预期的后果。这种担心在那段时间推动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本书的第一章就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下岬村去集体化是1983年后期开始的。当我第一次在这个村进行田野调查时，被解放的或松绑后的村民已经独立耕作和发展家庭经济达5年之久。于是，我着手调查两个问题：谁先富起来了？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分层发生了什么变化？当时，许多学者都在探讨和争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可能后果，即影响颇大的市场转型讨论（参见Nee 1989；Szelenyi 1988）。我的研究也与这场讨论有关。第一章的主要部分包括1989年我对村民经济地位的家庭调查结果和关于该村的经济社会分层系统从以政治资本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等级制度向市场双重等级制度变化的分析。

从1989到2008年，我每次去下岬村访问都会更新有关村民经济地位的数据资料，包括1998年完成的第二次农户问卷调查，其设计与1989年那次调查一样（详见第一章）。我发现，1989年调查结果的三分之二在2008年仍然有效，事实上一些新的发展证实了以前调查的理论假设。例如，“四属户”（因为户主的非农工作和现金工资而享有特权的家庭）的范畴已经完全消失，因为所有体格健全的村民都能在城市里找一份非农工作，拿到现金工资。领取工资的村干部数量在急剧减少，从1989年的13人降到1999年的5人，到了2006年就只有2人了。在

2006年取消农业税和其他地方税收后，只有上级任命的党支部书记和村会计从镇政府领取工资。因此，作为一个群体的村干部也基本上消失了。此外，在2008年最富裕的户主中，虽然有两人仍然依赖他们在早年的干部生涯中所建立的社会资本，但没有一个是在职干部。村民们认为特殊技能和运作大量现金经济的能力是当今农民致富的两个主要因素。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年最富裕的10户人家，到了2008年只剩下2户仍然名列最富10户之中。据村民们评论，其他8户的颓败都是出于个体的原因。

以上所有这些都证实了之前的结论，即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确实降低了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使得更多的个体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和勤奋而致富和实现自我。然而，通过市场来分配资源和生活机会并不一定使村落社会变得更加平等，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对一些人来说，甚至连社会流动的机会都未曾改善。例如，1989年最穷的10户人家中有8户仍然是2008年垫底的人家。为了走出贫困，90年代后期第9户人家搬出了下岬村，但是当他们在哈尔滨打工的时候，发现自己落到更差的境地，因为他们成为城市中最穷、最底层的人——没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1989年第10户最穷的人家是由一个光棍和他年迈的母亲组成的；进入新世纪后，他们娘俩都在贫困中死去。在2008年才被列入最穷10户的2家都来自1989年的贫困户群体。我在1998年的农户调查显示，1989年的贫苦户中只有少数几户人家提高了经济地位，而大多数人家在村里的地位还是维持原样，尽管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与改革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从1989到2008年，能够向上流动的主要是富裕户和一些中等水平人家。

现在看来，我意识到90年代初期我所做的调查，正如那时很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样，以社会群体的流动变迁来说明市场经济是公平的游戏，所以会降低社会不平等。但是，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意愿使得当时

的研究忽视了由此产生的社会分化和个体化的后果。幸运的是，正如本书所选入的所有文章一样，第一章首先是民族志的描写文本，其中包含了尽可能多的有关日常生活的细节。因此，除了变化中的社会分层之外，第一章还讲述了许多个体村民的故事。松绑之后，他们开始有了独立决定权并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例如拒绝给党支部书记儿子的婚礼送礼，或者公开向村干部挑战。更重要的是，公共生活的中心从村办公室转移到了村里的商店。当富裕起来的村民开始用消费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挑战现有的等级制度时，吉登斯（1991）所说的生活政治开始出现。个体村民的这些努力和能动性特点在之后的20年中继续发展，最终使他们走向乡村社会生活的中心舞台。

村民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转变是他们对社会分化的态度。1989年，许多村民抱怨以前的“阶级敌人”迅速东山再起，这是指那些革命后被划为地主和富农的人。事实上，这也是我调查社会分层状况的最初起因。正如第一章所引用的一个村民的话所揭示的，他们的不满建立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和早期的政治特权基础上。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对以前阶级敌人的抱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村干部腐败的愤怒谴责。许多村民公开表达了对那些勤劳、聪明、有文化的前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羡慕之情。甚至我在第一章所提到的那个愤世嫉俗的村民也改变了想法。在2003年我与他的一次谈话中，他承认自己不可能跟那些工作狂竞争。2005年，他怀着强烈的失落感在贫困中死去；不过当时他四个儿子中的一个已经是一家小店的富裕店主了。到了2008年，个人能力被界定为良好的教育、社会关系或赚钱能力。村里人频繁引用这个词来解释发生在许多村民个体身上的命运转换。结果，他们对于干部腐败的愤怒也变得温和许多，降到一个不重要的层面上；一些人甚至把腐败看成是一种个人能力，另一些人则对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阻碍他们自己的利益就无所谓。

第二章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农村改革对村干部权力的影响。这也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讨论市场转型的一个基本关注点。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我仔细考察了村落社会中干部权力的基础以及干部如何通过集体化的再分配机制垄断资源和生活机会。以群众专政和意识形态统治的名义行使权力是帮助干部垄断资源和生活机会的重要手段。反过来，村干部不得不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结果，村民们不得不依赖干部来满足生活中所有的需求；这便是魏昂德（Walder 1983）所指的“组织性依附”。改革时期的制度变迁，包括非集体化、村政权的重组、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淡化，从根本上大大降低了村民对干部的依赖。因此，到了90年代初期，干部的权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村里的朋友们给我提供了一个有关权力关系变化的更加简单、但确实很重要的风向标，那就是，当吵架演变成打架的时候，是谁在打谁——这是最直接的权力证明。在集体化时期，很少有村民胆敢与干部打架，但是在分田单干以后，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小事。

最重要的发现多半存在于民族志的细节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早期变迁的风向标已发展成为比较普遍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体权利的意识 and 为追求个体利益而产生的维权行动。在心态和实际行动方面，村干部都有一个从革命的螺丝钉到利益驱动的代理人的转变。这个转变在整个90年代有所加速。在第二章中，我回顾了岫村三个党支部书记的人生历程，展示了第三个领导人如何在90年代初期只想通过“上骗国家、下哄百姓”来聪明地玩这个游戏，赚足够多的钱。正如我在别处分析的那样，他的继任者，一个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管理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比他更糟糕（Yan 2003: 23-24）。一旦不再依赖干部来获得资源和生活机会，村民们便强烈反对干部干涉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村民们就会参与各种活动，从打架到诉讼到公众抗议，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对个体利益的追求与保护个体权利的抗